

操控与压抑：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的特征

刘溪涓, 关茗涵, 龙立迁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DOI:10.61369/HASS.2026010011

摘 要：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文聚焦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综合运用文献考据与文本细读等方法,深入剖析其强控性、抵抗性与大众化三大核心特征。本文先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着手,揭示日伪当局如何通过严密的审查体系,将翻译文学纳入殖民宣传体系。面对高压,译者则以隐晦的题材选择与表达方式,进行隐形抗争。译者也巧妙利用小说文体的特性,结合沦陷区民众的接受能力,舍弃晦涩译风,采用归化策略与生活化表达,使外国文学转化为民众易于理解的文本形式,既拓宽了传播范围,更让反抗精神在沦陷区扎根。一定程度上,本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理解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的多元抗争形态提供了新视角。

关 键 词： 抗战时期; 东北沦陷区; 翻译文学

Control and 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Northeast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ijuan, Guan Minghan, Long Li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he Northeast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war period. By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close reading of texts, it delves into the thre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literature: strong control, resistance, and popularization. Starting with Gramsc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the paper reveals how the Japanese-puppet authorities integrated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to their colonial propaganda system through a rigorous censorship mechanism. Faced with this oppression, translators engaged in covert resistance through subtle choices of subject matter and expression. They also skillfully util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vel genre, combined with the receptive capac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occupied areas, abandoning obscure translation styles and adopting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 and everyday expressions. This approach transformed foreign literature into forms easily understandable to the populace, thereby expanding its reach and allowing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to take root in the occupied area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fills gaps in existing research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e forms of literary resistance in the occupied area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northeast occupied areas; translated literature

引言

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是殖民与抵抗文化博弈的关键载体。当前学界对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翻译文学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成果。高云球以《盛京时报》《大同报》副刊为中心,揭示日本殖民者借翻译推行“文化再疆域化”及穆儒丐、古丁等译者的隐性抵抗;刘春英、罗天等学者则从权力话语等角度,探讨殖民政策与翻译活动的关联。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瓶颈,多聚焦于整个沦陷区的研究,对于该时期东北地区翻译文学集中研究较少。同时,其多关注主流报刊,对小众文本关注不足。本研究拟拓展多语种文本(英、日、俄语等),不仅关注主流报刊,也关注小众文本,采用文献考据、文本细读等方法,完善研究体系,为殖民文化抵抗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的强控性

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并非单纯的文化交流现象,而是日本殖民权力进行文化统治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场域。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所谓赢得霸权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确立道德、政治、知识的领导采取的做法是将自己的“世界观”(即意识形态)传播到整个社会中,从而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利益。”(王凤才,2007:36)日伪当局通过机构、知识和话语,隐秘地规训个体,塑造符合其统治需求的“真理”与主体,实行文化霸权。

抗战时期东北翻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沦陷初期(1931-1937),在东北,日伪政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控制网络,将翻译文学的生产、传播完全纳入体制之内。日伪对文学的统治和镇压主要采取三点手段:一是用法律限制,二是设立专门机构控制,三则是进行镇压和屠杀(冯为群,1993:158-159)。导致翻译活动几乎停滞。沦陷后期(1938-1945),日本当局加大管控力度,法规也日渐复杂烦琐,如《艺文指导纲要》。虽然译者采取文化抵抗,翻译文学异常繁荣,但仍受到高压管控^[1-6]。

从翻译文学的选材比重上看,日本文学译本数量激增。《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数据显示,日语文学翻译占比高达约32%,形成绝对优势,而俄苏约为16%、英国约为24%,其他国家文学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占比均等,约为4%(贾植芳等,2010)。这种失衡绝非市场或文化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殖民权力精心规划的话语战略。伪满洲兴亚社1943年发行的“新现实文艺丛书”、满日文化协会发行的“东方国民文库”等系列丛书的刊行,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罗天和胡安江,2011:84)。日伪政权通过系统性地译介日本文学(即从古典物语到现代“国策文学”),旨在向东北民众灌输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为所谓的“日满亲善”与“王道乐土”提供文化合法性依据。

在日伪当局建立的严格审查体系下,伪满期刊普遍丧失独立性,其内容生产被纳入殖民宣传网络。如《新满洲》、《艺文志》、《麒麟》等刊物(其中一些部分涉及翻译文学),《新满洲》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发行,《艺文志》由日伪控制下的“满洲文艺家协会”出版,《麒麟》所属的“满洲杂志社”,还发行了日本关东军机关杂志《ますらを》(日文杂志)。它们均为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效力的期刊。在内容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从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综合文化渗透到大众娱乐消遣的多层次文化控制网络。这些刊物通过软性宣传与硬性管制相结合的方式,企图粉饰侵略、弱化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7-12]。

翻译家们的个体命运,也因此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在日伪当局的管控下,以古丁作为代表的翻译家既沦为文化宣传工具,又持续受到监视(陈言,2005:42)。日伪对翻译家的控制,核心在于争夺话语权。其通过“拉拢规训”与“暴力驱逐”的双重策略,系统垄断跨文化阐释的路径。如翻译家古丁的处境揭示了权力将个体塑造为合格话语生产者的规训;朱雯等人的流亡则标志着权力对异质声音的排斥。

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的强控性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权力运作结果。殖民权力通过控制选材、出版与译者等,成功地将翻译文学改造为一个服务于其殖民统治的“文学生产车间”。

二、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的抵抗性

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初看上去好似遵循了殖民政权所强加的语言体系,不过细细品读一番之后便能够察觉到其中潜在的抵抗含义。这样的抵抗并不是凭借公开的声明来加以表达的,而是译者在政治风险和文化坚守这两者之间努力地去谋求一种平衡状态,来维系文化自主性。在受到严格控制的语言环境当中,他们凭借着翻译这种方式,成功地再现了人性以及伦理原则。

题材的选择能够体现出译者的价值取向。虽说日本当局针对出版物实施着颇为严格的监管举措,然而部分译者依旧把反战以及人道主义方面的主题带到译作当中,例如那些描绘普通人所遭受苦难的外国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并不处于主流地位,可是它们对于战争暴力以及人类困境所给予的关注,已然构成了对殖民统治的一种回应。题材的选择本身便体现出了译者对个人价值的默默坚持与守护。《大同报》的“翻译专页”共七期,是其“文艺”副刊专业中刊出最多的文学形式,所选译作主要来自西方左翼或反法西斯作者,如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以及爱伦·坡等。这些译作绝非无关痛痒的通俗作品,译作中多映射出反战反侵略倾向。《作风》杂志也出现《败北》和《嘉实》(均为中译版本)等反战题材。

部分译者在确保不逾越审查界限的前提之下,凭借保留原作所具有的异质性,运用灵活的表达姿态,彰显出抵抗的姿态。从表面看,译作或许会去迎合权力方面的要求。而在具体细节之处,它们往往会巧妙地加入冲突、隐喻等设计,达到让读者能够察觉到其表达内容和含义的效果。译者雪笠译爱伦·坡的《红死的假面》(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中,描写了一场名为“红死”的瘟疫在全国蔓延。一天,在普劳斯派罗王子的假面舞会上,“红死”不期而至。舞会上的人们无法抵御纷纷惨死,终臣服于它的无边统治。译者借瘟疫隐喻殖民统治者,而惨死的和屈服于“红死”统治下的人们,也正是当时东北人民的缩影。还有《大同报》中安德烈·马尔罗纪实文学《希望》(L'Espoir)的一小部分。译者鹿野将题目定为《这是战争》。题目从《希望》转变为《这是战争》暗含隐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军自满洲向中国内地进犯,即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形式十分严峻。这一标题的改动,不仅反映了译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动改写实践,也揭示了翻译在意识形态博弈中的重要作用。

总之,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所具有的抵抗性并不是公开直接的对抗形式。在权力对其进行控制的情形之下,译者借助题材选取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努力去保持能够展开对话的空间,以此来维持自身文化以及伦理层面的自主性。

三、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的大众化

一改往日追求典雅,战时翻译更强调“通俗化”和“民族化”(邹振环,1994:93)。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审美价值

被迫让位于政治诉求,催生以大众为导向的文学范式。各阶层文人“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不约而同地与政治力量共谋,此时文学起到“宣传和鼓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读者的心理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作品走向大众化。在战争时期,民众的生活压力颇大,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对于那些轻松愉快、情节丰富并且容易引发共鸣的作品,其需求是极为旺盛的。译者以及编辑正是依据这样的情况来挑选并调整作品,进而让作品拥有情感抚慰的作用以及能够实现现实投射的功能。

在体裁挑选方面,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大众化倾向。据不完全统计,在占领区的翻译文学当中,大概有60%的作品都属于小说范畴,如《鲁宾逊漂流记》和《少奶奶的扇子》(赵献涛,2013:89)。小说占比极高,远远超出诗歌、戏剧或者散文等其他体裁作品。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深刻指出,小说因其通俗性、叙事张力与情感渗透力,成为最具大众传播效能的文体。通俗杂志《麒麟》中有多篇侦探小说,其中,外国译作有《巴黎防控地图》、《密码与黄色眼镜》等。数量众多的译作也会刊登在各类报刊的副刊之上,比如《盛京时报》、《大同报》等,这些副刊有着较强的灵活性,而且受众群体颇为广泛。

部分译者对译文语言进行处理,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有时还将方言融入其中。自《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创刊号起,便连载翻译作品美国通俗小说《黄艳白侣》。译者充分考虑本地读者接受能力,采用“译述”策略(高云球,2013:82)。这种以现代白话文铺陈的通俗化处理,既降低阅读门槛,又能够通过通俗情节引导民众关注文本。在古丁译俄国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中,把“Эге! нет, голубчик, ты не в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идешь, ты спешишь вон за тою, что бежит впереди, и глядишь на ее ножки”翻译成“哼,别装像了,那小子装模上班的样子,其实在跑在前面的女人的后面盯梢,心想

瞧瞧她的大腿的”,这里面语言非常符合市井吵架或背后议论人时的口吻。在鲁风译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Der Steppenwolf)时,将作品名译为《神气不良的老小子》,将北方方言融入其中。这样的文章更贴近生活,不仅降低了理解门槛,也增强了读者的文化归属感和亲近感。

这些译作凭借着贴近日常生活的表现形式、平易近人的通俗语言、广受欢迎的流行体裁,得以渗透进社会大众之中。不但使读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而且还让文化联系以及社会价值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进而成为了连接战时现实状况与人们文化信念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四、结语

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东北地区的翻译文学绝非对原作的机械复制,而是译者基于特定历史语境的主动改写实践。这种改写既受制于日伪当局施加的意识形态操控,又通过隐晦的题材选择等方法实现抵抗性表达,同时以归化翻译策略适配沦陷区民众的接受能力。翻译在此过程中成为意识形态博弈的场所,就像翻译文化派学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说的那样,“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此会操纵文学在特定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发挥作用”(André Lefevere,2004: General editors' preface)。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有限性和保存状况的不理想,作者仍面临一定困难,难以对这一时期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活动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挖掘和整理相关史料,以期更全面地揭示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尽力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参考文献

- [1]王凤才.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03):34-42.
- [2]冯为群.谈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期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01):156-163.
- [3]贾植芳,等.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翻译文学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 [4]罗天,胡安江.分割的权力各异的翻译——从权力话语的视角看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J].外国语文,2011,27(04):82-85.
- [5]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J].抗日战争研究,2005,(04):26-45.
- [6][美]爱伦·坡:《红死的假面》,雪笠译,载《大同报》,1938年7月22、23、24日.
- [7]邹振环.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3):89-94+22.
- [8]赵献涛.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34(01):87-90.
- [9]高云球.1932-1945: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 [10][俄]果戈里:《狂人日记》,古丁译,载《明明》,1938年,第二卷第四期,第19页.
- [11][德]赫尔曼·黑塞:《荒原狼》,鲁风译,载《文最》,1940年,第一期.
- [12]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Press, 2004: General editors' preface.